

蔡邕集

编年校注

①上

● 邓安生

河北教育出版社

蔡邕集

编年校注

①上

● 邓安生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蔡邕集编年校注/(汉)蔡邕著;邓安生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ISBN 7-5434-4501-8

I.蔡… II.①蔡… ②邓…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汉代
IV.I21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2863 号

书 名	蔡邕集编年校注
作 者	邓安生
责任编辑	郝建国
装帧设计	吴建工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0.2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501-8/H·35
定 价	26.40 元(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前 言

关于蔡邕的生平事迹，本书后面附了《后汉书》的本传及其他有关资料，又附了笔者所撰《蔡邕年谱》，读者可以参看。这里再补充说明几点。

蔡邕出身于世族地主家庭，从小“骋驰乎典籍之崇涂，休息于仁义之渊藪，盘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与为友”（《释海》），“忠孝素著”（本传引太尉马日碑语）。儒家的用世精神与责任心驱使他先后两次进入仕途，忠义观念害得他获罪髡徙朔方，亡命江海，以至最后丧了性命。因此，蔡邕的主导思想，应属儒家体系，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我们在对蔡邕的思想作总体把握时，还不能不看到他所受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本传说，邕“六世祖勋，好黄老”。本传未明言蔡邕的祖父、父亲是否亦好黄老，但汉人最重家学，从“父棧，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这话来看，蔡邕的父亲显然是受了祖传黄老思想影响的。此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就是蔡邕的母亲袁氏，是司徒袁滂之妹。《后汉书·董卓传》注引袁宏

《后汉纪》说，滂“纯素寡欲”。“纯素寡欲”正是道家思想的主要表现。蔡邕与袁滂关系亲密，他在《与袁公书》中说：“朝夕游谈，从学宴饮，酌麦醴，燔干鱼，欣欣焉乐在其中矣。”可见他也是受了袁滂“纯素寡欲”的思想影响的。家庭与亲舅的熏陶，从小培养了蔡邕的清静恬澹之性：

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蹕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释海》）

这确是他早年心志的真实表白。在现存《蔡邕集》中，不但有歌颂仙人的《王子乔碑》，而且不止一次地礼赞洪崖、赤松子；不但有老子守冲戒盈的思想痕迹，甚至带着庄子安时处顺、持神任己、与物无争等观念的明显烙印。他善于把道家的清静无为与儒家的“用行舍藏”巧妙地统一起来，以之观览世事，并作为自己的人生哲学。在《郭有道林宗碑》中，他称颂郭泰“将蹈洪崖之遐迹，绍巢由之绝轨，翔区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在姜肱、圈典、李休、焦先生等人的碑铭中，对他们摒弃荣华、沉潜大道的行为一再赞扬。汝南高贤周颙“少尚玄虚”，“慕老聃清静”，屡辞征辟，杜绝人事十余年，而独引蔡邕为同调。陈留处士圈典“隐身高藪”，终身不仕，临终顾命曰：“知我者其蔡邕。”至以碑铭相托，足见蔡邕与他们是“臭味相与”，志同道合的。

世族地主的家庭地位，叔父蔡质历官尚书、下邳相、卫尉，外舅袁滂官至司徒，加以“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算术、天文，妙操音律”（本传），蔡邕显然具有从宦的优越条件，然而他“闲居玩古，不交当世”，直到三十八岁才应司空乔玄之辟，由此不难看出道家清静玄默思想对他的影响。而且入仕以后，他也始终消极于进取，积极于著述。从建宁三年辟司空乔玄

府，至光和元年八月髡徙朔方，是他入仕的第一时期。平心而论，凭借他的家庭地位、个人才学，以及太傅胡广是他的老师、司空乔玄“甚敬待之”等外部条件，正所谓取富贵如反掌，“其进取也，顺倾转圆，不足以喻其便”（《释海》）。然而他“心恬淡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八年时间内，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参与政事，只不过一介文学之士而已。记载“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考蔡邕事迹，建宁三年、四年、五年皆在京师，斑斑可按，其出补河平长，充其量不过数月，甚或实未赴任，仅有虚衔而已，正如他后来辞巴郡太守不拜而留为侍中那样。从光和元年至中平六年，前后十二年，亡命江海，完全脱离官场，可以不论。从中平六年八月为董卓所辟至初平三年四月为王允所杀，前后五年（实际前后不足四年），是蔡邕的第二次从仕，也是蔡邕仕途上飞黄腾达的时期。“三日之间，周历三台”的骤迁，以及巴郡太守、左中郎将、高阳乡侯的显位宠爵，对于那些汲汲进取的人来说，该是多么的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而在蔡邕，则看不出丝毫的高兴与得意；相反，对于每一次升迁，他总是“怔营惭怖，屏气累息”，惶惶然不可终日。对于董卓的“敬重”与厚待，他也总觉不安，“每存匡益”而外，畏祸遁逃之心时复溢于言表。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他对董卓的所作所为有所不满，有危厉之感；又何尝不是出于“鸛鷓巢林，不过一枝；鼯鼠饮河，不过满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让高阳侯印绶符策表》）的内心！年轻时他闲居守静，让州辟与同郡申屠蟠；壮年时无意进取，志在著述；经过十二年的亡命流离，年已迟暮，官爵富贵，何足道哉！

综上所述，蔡邕的思想应当说是以儒学为主的儒、道两家的杂糅。他的这种儒、道双修，不仅由于祖传家学的影响，也是贾谊、司马迁以来汉代士大夫中的普遍风气。

儒学到东汉章帝以后，经学神学化已形成完整的体系，今文

经学固不待说，即使古文经学也没有彻底摆脱神学的羁绊。蔡邕是位研治今文经学而又旁及古文经学的学者，他的作品充斥着天人感应、符瑞灾异之说，充斥着谶纬之词，不足为怪。今天的读者对此毫无疑问应当有所批判。值得指出的，是他能以认真的实证态度进行天文、历法的研究，“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请太史旧注，考校连年”（《戍边上章》）。在《历数议》中，他还对冯光、陈晃散布“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的反动的唯心主义谬论，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指出尧、舜、汤、武治历明时，“犹遇水遭旱，戒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提出“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但“求取合于当时而已”的观点。自然科学的实证态度和方法，把他引到了社会发展进步论。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他用天人感应来解释灾异，主观上并非出于宣传神学迷信，而是为了匡谏君主“畏灾责躬”，革除弊政。

二

蔡邕的一生，是在以外戚为代表的豪强地主与宦官集团交替专权、相互斗争残杀的六十年中度过的。蔡邕出生后的第二年，梁商就以皇后之父官拜大将军。梁商死后，其子梁冀继其官爵。冀极其专横残暴，亲属、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以致时人有“豺狼当道”之讥。延熹二年八月，桓帝与宦官唐衡、单超、左悺、徐璜、具瑗谋诛梁氏，连及公卿、列校、二千石数十人，朝廷公卿之位几为之一空。唐衡等五人同日封为县侯，世称“五侯”。国家大权从此落入宦官之手。这年蔡邕二十七岁。宦官的专权乱政，激起豪门世族及士人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宦官集团采取强硬态度加以镇压。延熹九年，初兴党狱，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二百余人被指为党人，被捕入狱。灵帝建宁元年，大将军窦

武、太傅陈蕃欲诛宦官，反为宦官曹节、王甫所害。宦官趁机再兴党狱，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等下狱死，牵连被杀者百余人，接着令全国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后汉书·灵帝纪》）。直至中平六年董卓率兵将入洛阳，袁绍尽诛宦官，长达三十余年的宦官专权，豪强与宦官争权厮杀的局面才得以彻底结束，而开始代之以军阀混战。蔡邕也就在军阀混战开始之际，结束了他的生命。

蔡邕亲身经历了汉末外戚专权与宦官擅政的两段历史，而感受最深的要数后者。他对梁冀的专横跋扈，在《述行赋》、《朱公叔鼎铭》、《陈留太守胡公碑》等文中，都有讥刺。但是作为世族地主中的一员，作为封建正统观念极强的士人，他对宦官更有一种本能的鄙视，对宦官的专权乱政更是深恶痛绝。因此，当中常侍徐璜等白朝廷征他赴洛阳，他便觉得是对他的污辱，行到偃师，“称疾而归”，忿而为作《述行赋》。在《答诏问灾异》中，他敢冒杀身之祸，直言指斥永乐门史霍玉“依阻城社，大为奸祸，盗宠窃权”，指斥程璜“将为国患”。他也因此而触忤权阉，获罪遣戍朔方。中常侍王甫权势灼天，其弟五原太守王智为他置酒饯行，他竟敢在酒席上不为答礼，当众折辱王智。

蔡邕其生也晚，没有直接卷入延熹末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没有遭罹党祸。建宁三年入仕以后，他也不过是一名小小的御用文人，只不过权宦的俎上肉，没有资格同权宦展开面对面的殊死斗争。但我们从他对待党人的态度，仍然可以分明地感觉到他同宦官势不两立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对党人反宦官斗争的支持。

羊陟，字嗣祖，泰山梁父人，官至河南尹，名列“八顾”，为泰山党魁，与蔡邕为对门九族（儿女亲家）。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官尚书，名列“八厨”。延熹末，二人皆罹党祸，蔡邕

与其叔父蔡质营护之。对此，蔡邕在《尚书诂状自陈表》中作过申辩，但他那苍白无力的辩白，实在难以洗脱自己。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名列“八顾”之首，与党人首领李膺、赵典、范滂等人关系密切。泰卒，蔡邕与卢植、马日磾亲赴介休吊祭，邕犹为泰作墓碑。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延熹末罹党祸系狱，后遭禁锢。及卒，邕为作三碑，盛称其德。

房植，字伯武，甘陵党魁。党议初起，乡人有“天下规矩房伯武”之目，延熹末卒。邕为作碑文，称其“当强暴，弗避也”，“邪慝是仇，直亮是与，刚则不吐，柔亦不茹”。

度尚，字博平，山阳湖陆人，名在“八厨”之列。延熹七年，尚讨平零陵、桂阳，邕为作功德碑《荆州刺史度侯碑》。

对于其他反对宦官的人们，蔡邕也为之树碑立传。例如太尉陈球，光和二年以谋诛宦官下狱死，时蔡邕正亡命江海，避权宦王甫之怨，却不顾危险，为陈球连作三碑及《太尉陈公赞》，这确实是需要有点勇气的。又如太尉李咸，力排宦官，史称“在朝清忠，权幸惮之”。李咸卒后，邕为作碑文，对他“激垢浊以扬清”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

三

蔡邕对政治无兴趣，更缺乏政治才干，在汉末的政治舞台上未见作为，然而在文化圈子内却异常活跃。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和造诣，对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经学发展到汉末，出现了今文、古文相互吸收、兼容的趋势，“郑学”为其代表。蔡邕与郑玄同时，治经成就不如郑玄，却也是精通今文，兼通古文的经学大家。蔡邕对经学的研究，除与马日磾正定刊刻《礼记》石经外，主要表现在撰写《明堂月令

章句》。《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为十二卷，而两《唐书》缺载，知其书中唐以后已佚，今已无从得见全豹。所幸清人余萧客、陆尧春、蔡邕等各有辑本。此外，蔡邕所撰《明堂月令论》、《月令问答》二文尚存。据二文可知，蔡邕所撰《明堂月令章句》，于《月令》正文，依据《礼记古文》的文本，其解说《月令》，则多采《周官》、《左传》之文，亦即从古文经学，与当时的今文家以意傅会、横生枝节者异趣，而自成一家之说。南朝齐梁以后，儒者颇重其书，刘昭注《续汉志》，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即多所征引。

作为封建帝王的一名御用文人，蔡邕一生的主要兴趣和精力，在于“撰集汉事”，补续汉史。《戍边上章》（一名《上汉书十志疏》）曰：

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世祖以来，唯有纪传，无续志者。……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即〕建言《十志》皆当撰述，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其难者皆以付臣。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请太史旧注，考校连年，往往颇有舛舛，当有增损，乃可施行，为无穷法……会臣被罪，逐放边野，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缕缕之情，犹以结心，不能自达。

可见蔡邕是以补续《汉书》“十志”为已任的，并为此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心血。“十志”的名称，《蔡邕别传》所载有《律历》、《礼》、《乐》、《郊祀》、《天文》、《车服》六志，据本传又知有《五行志》，《续汉书·礼仪志》刘昭补注引有《朝会志》。又《续汉志》补注及唐人类书皆称蔡邕《礼乐意》，然则《别传》所云

《礼意》《乐意》当作《礼乐意》。其他三志，史籍缺载，据《汉书》十志之名，所缺疑为《刑法》、《地理》、《艺文》。此外，蔡邕还撰有《灵帝纪》及四十二篇列传，《戍边上章》未言及之，其最后完成当在光和二年以后。遗憾的是，“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故“未见录以继后史”（本传）。但晋代司马彪撰《续汉书》，其中《律历》、《礼仪》等八志，显然吸收了蔡邕“十志”的部分成果，刘昭补注《续汉志》，也征引了蔡邕《律历意》、《礼乐意》、《郊祀意》、《天文意》、《车服意》、《朝会意》的部分文字，真可谓硕果仅存了，由此我们仍可窥见蔡邕对中国史学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于蔡邕的文学成就，前人所称道的大抵是他的碑文，而且时有微辞，以为蔡邕为人滥作碑文，颇有韩退之利人润笔之嫌（见王士禛《带经堂集·蚕尾续文·跋蔡中郎集》）。今人所著诸文学史，于蔡邕或只字未提，或一笔轻轻带过。其实蔡邕的文学成就远不止碑文与《述行》一赋。本传云：“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海》、《叙乐》、《女训》、《篆势》、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蔡集亡于隋唐以前，他的许多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清人严可均所辑，蔡文存目一百四十余篇，亦未称完备。因此，“百四篇”之称，或据当时蔡集总目而言，不能包括蔡邕的全部作品。然即此亦不难看出，蔡邕是个多产的作家，而他的作品题材多样，且涉及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是一位极富创作才华的作家。

《蔡邕集》今存诗五首，其中《饮马长城窟行》是否蔡邕所作，尚难确定，姑置不论；《初平诗》仅存二句，亦难论评；《答对元式诗》、《答卜元嗣》为应酬之作，未能称工。但《翠鸟诗》托物述怀，抒发流离羁旅之感，情深意挚，比兴婉洽，词采清丽，堪称汉代五言诗的上乘之作，可以少少许胜人多多许。

蔡邕的赋今存十五篇（包括残篇），这在数量上已不算少，汉末以前，恐罕有其匹。文学史上讲到汉末的抒情小赋，大抵以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为代表作，而对蔡邕赋却很少论及。其实，无论从思想的深度厚度，还是从艺术表现力来看，《述行赋》何尝稍逊张、赵之作？依我个人之见，《归田赋》、《刺世嫉邪赋》简单直露，缺乏深致，《述行赋》深厚、委婉、跌宕，从感情表达来说，《述行赋》倒是要略胜一筹的。《述行赋》之外，《青衣赋》、《检逸赋》、《协初婚赋》迢递抒情，《汉津赋》、《琴赋》、《笔赋》叙事抒情兼用，均是情文并茂的小赋佳作。

刘勰云：“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文心雕龙·诔碑》）又云：“蔡邕铭思，独冠古今。”（上书《铭箴》）可谓推崇备至。蔡集今存碑铭五十余篇，超过其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是蔡邕文章的主要部分。从内容分，大致有四类：一为其亲故及其家属而作，袁氏、胡氏、乔氏等人碑铭即是。此类碑铭数量亦最多，仅胡广一家便多达六十篇。二类为生前反对过宦官的党人与官僚，朱穆、郭泰、陈寔、陈球、李咸等人碑铭即是。三类为隐居不仕与有道德学问者，范史云、姜肱、圈典、李休、周勰等人碑铭即是。四类为其他，有《光武济阳宫碑》、《张玄祠堂碑》等，共六篇，大抵受人所托而作，属于所谓“润笔”之作，约占全部碑诔的十分之一。根据以上粗略的分析，不难看出，蔡邕为人作碑铭诔赞，并非一味滥作、苟作。至于“谀墓”之嫌，似乎蔡邕也有难言之隐。古代对碑、铭、诔、赞等文体本有一定的规定或要求，例如《礼记·祭义》说：“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文心雕龙·诔碑》说：“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

朽。”“夫属碑之体……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蔡邕既要为人作碑、铭、诔、赞，就不能不为死者歌功颂德，即使像袁满来、胡根那样早夭的幼童，无任何德行可述，也不能不说几句诸如“生有奇表，幼而克才”、“夙智”、“早惠”之类的话，要想做到不溢美，简直不大可能。我们从蔡邕那“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的喟叹中，亦可窥见他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碑文主要靠裁断，故“资乎史才”。蔡邕正具有这方面的才能，因此他的碑文写得典雅、精允，为常人所不能及。刘勰论之已详，兹不赘。值得一提的是蔡邕的诔、赞。今集中虽各只一篇，即《议郎胡公夫人哀赞》、《济北相崔君夫人诔》，两篇都是为人代笔，但写孝子的悲痛之情，一如己出，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极强的感染力。像这样具有强烈的文学性的诔、赞，不论在汉代还是汉代以后，都是不多见的。

诗、赋、碑、铭、诔、赞之外，蔡邕还写了一些奏疏、论议、杂文，其中也不乏佳构。《戍边上章》是光和二年上的奏章，开篇在略表获罪髡徙朔方的心情后，接着剖陈自己撰补汉志的志向、经过，以及“适有头角”，被罪“逐放边野”、“悬命锋镝”的处境，笔带感情，情词危若，感人肺腑。《宋公叔谥议》、《和熹邓皇后谥议》、《历数议》、《谏伐鲜卑议》等引经据典，剖析纤毫，结构谨严，如老吏断狱，非大家手笔不能办。《释诲》以务世公子设问、华颠胡老作答写法，讥时刺世，表白自己遗俗守静的志尚，情理交融，词采富艳，可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駰《达旨》争雄。本传云：“邕实慕静，心精辞绮。”“心精辞绮”四字不但恰当地概括了蔡邕作品的风貌与特色，也是对蔡邕文学成就的高度肯定。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辞绮”的作品虽然可以车载斗量，但堪称“心精”而又“辞绮”的作家则屈指可数。

蔡邕的多才多艺，还表现在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他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一是擅长篆、隶、八分，二是创造了飞白书体。唐张怀瓘《书断》说：“（邕）工书，篆、隶绝势，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创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真异能之士也。”又说：“伯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蔡邕的书法墨迹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从唐宋以来人们对他的残存碑录的交口称赞中，从“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巷”地观摹东京太学门外的《礼记》石经的记载中，不难想见他在当时及对后世的影响。他的飞白书体，“得华艳飘荡之极”，汉末魏初，多用以题署宫阙，不仅丰富了中国的书法艺术，而且对于中国画枯笔笔法的形成也有直接的影响。此外，蔡邕还给后人留下一篇珍贵的书法论文——《篆势》，文虽不长，但从文字的起源，写到篆书的形体特征，用笔要领，以至篆书的作用，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其中融进了作者实践经验的深刻体会，故颇有精辟独到之见，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宝贵财富。

蔡邕的画没有传世，中国绘画史也很少提及，故后代鲜有人知，实则蔡邕是颇精于此道的。《太平御览》七五〇引孙畅之《述画》曰：“汉灵帝诏蔡邕图赤泉侯杨喜五世将相形象于省中，又诏邕为赞，仍令自书之，邕文、画、书于时独擅。”又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以赵岐、刘哀、蔡邕、张衡并列，亦可见蔡邕在汉代画坛上享有盛誉。

蔡邕的音乐造诣与成就，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焦尾琴”的故事更是传颂不衰，人所共知。其实，他对吹笛也很擅长，只不过为其琴名所掩，故不甚昭著于世。《世说新语·轻诋》刘孝标注引晋伏滔《长笛赋·叙》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长笛，传之耆老，云蔡伯喈之所制也。初，邕避难江南，宿于柯亭之馆，以竹为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为笛，音声独绝，历代传之至于今。”此与“焦尾琴”故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汉书》

本传李贤注引张鹭《文士传》、《御览》一九四引《会稽记》，所载与此略同，当属可信。相传他曾著《琴操》，《文选》嵇康《琴赋》注引《歌录》、《初学记》十六引《琴历》并云蔡邕作《琴曲五弄》，可知蔡邕不只善于吹奏，而且能够制作新曲，对乐律非常精通。《蔡邕集》中有《琴赋》一篇，以生动的笔触，描写“指掌反覆，抑按藏摧”的弹琴动作，以及“走兽率舞，飞鸟下翔”，“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乱节而忘形，哀人塞耳以惆怅，辕马蹠足以悲鸣”的音乐效应，这在汉代以前堪称空谷足音。蔡邕在中国音乐史上应当占有重要的一席。

四

蔡邕的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二卷，注云：“梁有二十卷，录一卷。”（汲古阁本《隋志》作十二卷，非是）是则蔡集至隋已无完帙。唐人渐次搜求，增至十五卷，吴兢《西斋书目》著录之。唐末之乱，文献罹劫，《崇文总目》著录仅五卷，《宋书·艺文志》为十卷。北宋天圣间欧静序蔡集，称“今之所传才十卷，亡外计六十四篇”，其中《宗庙颂赞》等三篇为后之好事者混入他人之文，“非十五卷之本编”，知蔡集亦未免于唐末兵燹之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称蔡集二十卷，“二十卷”当即“十卷”之误。

欧静序本是现存蔡集的祖本，然至明代亦亡。今存蔡集可知者约二十余本，大致可分为六个系统：即明兰雪堂活字本、徐子器刻本、乔世甯辑本、汪士贤校本、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清代参校本（参见于迺麇《蔡中郎集版本源流考》，载《河南图书馆馆刊》）。活字本是现存蔡集最早的本子。此本首冠欧序，正集十卷，收文六十三篇，已删去欧序所称混入的伪作《宗庙颂赞》及《祀乔太尉文》，然又误将《宗庙祝嘏辞》离为二篇，故

实存文六十二篇，若加上删去的两篇伪作，与欧序所称十卷六十四篇之数切合，陆心源谓活本出自欧本，其说是也。活本正集之后附有“外传”，收文八篇，其中《隶势》为卫恒作，见《晋书·卫恒传》，刊刻者误辑入集，亦可见其浅薄与粗疏。又此书刊刻不精，讹脱严重，但因尚存宋本之旧，故颇为清代校勘家所重。徐子器本十卷外纪一卷，系明万历二年陈留令徐子器校刊“吴中旧刻”，卷帙、篇目、编次顺序与活本悉同，文字亦出入不大，笔者疑其所谓“吴中旧刻”，当即兰雪堂活字本。而刊刻较活本为精，故亦为黄丕烈、顾千里所重。黄、顾校刻蔡集，即以之为底本，以活本及叶石君朴学斋所藏旧钞本作参校。咸丰初，高均儒又以黄、顾校刊本作底本，复取乔世甯、刘嗣奇、张溥、汪士贤、朴学斋旧钞本等比勘，正集、外纪而外，增文四卷为外集，刊刻行世，世称善本，是为杨以增海源阁本。与此同时，先有严可均在编纂《全后汉文》的基础上，钩稽史书、类书、总集中的蔡文残篇断简，成《蔡中郎集》十九卷，凡一百四十八篇（子目不入数），虽疏于校勘，而搜罗之备，超过张溥本及海源阁本。后又有罗以智“详稽博考”，成《蔡中郎集》十卷外集四卷，孙诒让称其稿本极精博，惜未刊行，稿本亦不知落于谁手。由于杨以增海源阁本校勘较精细，严可均本搜辑较完备，活本刊刻最早，因此今编年校注蔡集，即以杨本为工作本，以严本、活本对校，同时参校他本他书，以便把六个系统的本子统一起来，兼取各本之长。本书所据蔡集及参校各本版本为：

杨以增刻《蔡中郎集》	四部备要校刊本
严可均辑《蔡中郎集》	北京图书馆缩影 邢氏求己斋钞本
严可均辑《全后汉文》	中华书局影印本
兰雪堂活字本《蔡中郎集》	四部丛刊影印本
汪士贤校刊《蔡中郎集》	明嘉靖三十七年序刊本

张溥《蔡中郎集》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许瀚《杨刻蔡中郎集校勘记》	齐鲁书社铅印本
《后汉书》	中华书局标点本
《文选》	中华书局影印本
《古文苑》	四部丛刊影印本
《北堂书钞》	中国书店影印孔广陶校注影宋本
《艺文类聚》	中华书局校点本
《初学记》	中华书局校点本
《太平御览》	中华书局影印本
《水经注》	王国维校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事类赋》	中华书局校点本
《隶释》	中华书局影印本

鉴于清代校勘家多注重不同版本的比勘，而较少注重本校，尤其忽略用史书材料作他校，因此，《编年校注》在对校、参校的同时，在这两方面给予了较多的注意。例如《坟前石碑》：

维汉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粤四月丁巳，文忠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卒于京师。

黄、顾、杨、严、许诸家皆无校。按古无“延熹六年粤四月丁巳”此种文法，“粤”字当误。按《朱公叔鼎铭》作“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据此可知“粤”为“夏”之讹。又“丁巳”与“乙巳”抵牾，必有一误。检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延熹六年四月无乙巳，而四月十一为丁巳，然则《鼎铭》“乙巳”当为“丁巳”之讹。又如《和熹邓皇后谥议》：

是以尚官省服，衣不粲英；饗人彻羞，膳不过择。